

中国
文学研究
年鉴 1985

ZHONGGUO
WENXUEYANJIU
NIANJIAN

R
I206-54
1(85)

ZHONG GUO
WEN XUE YAN JIU
NIAO JIAN

1985

中国文学研究年鉴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中国文学研究年鉴》编辑委员会

编



R I206-54 1(85)

C474814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文学研究年鉴》编辑工作人员

主编 吕林
副主编 赵远帆
责任编辑 陶国斌
编辑 蔡田明
装帧设计 王堃

中国文学研究年鉴（1985）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中国文学研究年鉴》编辑委员会

中国文海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16开本 50.5印张 5插页 1208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120册

书号：10355·175 定价：平装本10.00元
精装本12.20元

《中国文学研究年鉴》编辑委员会

主任 何西来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年 尹锡康 甘粹 吕林

许觉民 刘魁立 何西来 张炯

林非 钱中文 徐公持 蒋守谦

樊骏

NJ 14/9

前　　言

何西来

这是我们编的第五本《中国文学研究年鉴》。从组稿、集稿、推敲、修改，到大致编定，费时已逾半年。由于文学研究领域广阔，头绪繁杂，问题众多，加以材料汗漫，梳理不易，就不能不稍稍多花些时间。尽管如此，作为一部为读者提供检阅文学研究全貌的资料性工具书，它肯定还有许多不完备之处，有待于今后改进。

第一本《年鉴》的前言是荒煤同志写的，由他署名。那时他正负责着文学所的全面工作。关于《年鉴》的编辑缘起和方针，他都在那个前言中作了比较充分的说明。此后几年，编辑体例和范围，虽小有调整，但宗旨未变。这几年的前言，曾先后由负责过这项工作的许觉民和张炯同志撰写，有两册不曾署名。荒煤在他写的前言中说：“编辑和出版这本《年鉴》的目的，就是希望反映我国文学研究的基本情况和重要成果，并汇集有关文学研究和评论的重要文献和资料，以便国内外中国文学研究工作者和其他有关人员查考和使用。”五年来，我们基本上是按照这样一个目标工作的，尽管还存在着明显的缺欠和不足。

鉴，是镜子。以鉴名书，多有鉴往知今，垂鉴后世的意思。年鉴带有史鉴的性质，但它到底能不能起到“鉴往知今”，“垂鉴后世”的作用，却首先要看是否确切地勾勒出了这一年文学研究的发展轨迹，材料是否翔实，描述是否客观，判断是否准确。为了使年鉴提供的材料和线索尽可能客观、完备、科学，避免重要的遗漏，我们一般都是先由各学科的研究人员分头将全年有关本学科的论文、著作全部读过，作好卡片、笔记，然后在研究室内组织汇报、交流、讨论，将问题加以初步梳理，归纳成几个方面，最后再按问题按方面组织人分头去写，去编。

年鉴的主体部分是概况，这也是难度较大、费工较多的部分。虽然执笔者人数不多，但却常常需要集中几乎全所研究人员的劳动。有时，我们也约请个别所外同志担负一点写作任务，但这不是常例。概况的写法，带有述评性质，虽然评述者可以有自己的倾向和判断，但更侧重于资料性和客观性，以客观的介绍和描述为主。为了使读者对一九八四年文学研究各学科所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能有一个宏观的动态的把握，我们这次组织编发了一组分别由陈涌、朱寨、樊骏、刘魁立、钱中文、徐公持、王俊年等同志所写的笔谈。这组笔谈，主要不是对已有情况的静态描述，而是着眼于问题的探讨，有设想，也有预测。综合起来看，有助于读者对文学研究发展趋势的了解。

一九八四年的文学研究，有两个趋势值得特别注意：一个是文学观念更新的步伐加快了，一个是研究方法、批评方法的问题变成了热门话题。这两大趋势几乎反映在文学研究的所有学科，许多重要的突破和进展，都与之有关。

一个时代的文学观念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受着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文化—心理结构、以及审美情趣、价值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在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变革的年代，文学观念也会有相应的变革。我们所说的文学观念更新，就是指这种变革。今日中国，正在经历着深刻而又广泛的伟大变革，它是推动文学观念更新的主要动力源。

社会生活的变革总是首先从文学创作上反映出来。创作前进了，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

需要研究，需要给予理论上的解答和说明。这时，旧的观念不够用了，有的过时了，有的僵化了，如果还固守这样的观念，就会严重束缚很有活力的新的创作潮流，于是，观念更新的问题便尖锐地提上了日程。新的创作潮流把新的文学观念召唤到历史的前台来，是为了给自己的前进提供理论的武装，以便战胜旧观念的桎梏，争取生存的空间。所以，文学观念的更新，一般都是某种新的创作潮流走上自觉的标志。新的文学观念当然不是消极的，它一旦产生，站稳了脚跟，就会回过头来给创作实践以强有力的推动，使之向更高、更完善的境界发展。而进一步发展了的创作潮流，又将新的经验和思考提炼、升华，补充到文学观念中去。如此循环不已，互相促进。这样的描述实际就是新时期文学的历史运行过程和逻辑运行过程。

一般来说，文学观念的更新多是首先发生在与当代文学创作关系比较密切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中，然后才逐渐扩展到文学史学以及文艺学的其它诸学科，如古典文学研究，神话学研究，文学档案学，诗学，风格学等等等。我们的年鉴评述、介绍了本年文学研究各学科的许多重要争论，这些争论，如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现实主义问题，现代派问题，甚至具体到如近代文学的时限划分问题，“五四”文学革命的指导思想问题等等，都无不直接、间接地与文学观念的变迁有关。

近期文学观念的变化，虽然涉及文艺美学和文学理论的广阔领域。但细加考校，却不难发现，其核心问题是一个大写的“人”，是关于人的观念的变化。这个人不是抽象的，僵死的，而是具体的，生动的。作为文学的描写对象，人在现实生活中是实践的主体，也是创造历史的主体。而在文学活动的全过程中，人既表现为创作过程中的主要描写对象，又表现为这个过程中的创造主体，当然也表现为鉴赏过程中的接受对象和接受主体。这种对人作为主体的重视，可以称为主体意识的自觉。主体意识的自觉，使作为“人学”的文学，真正回到了自身。它仿佛一下子拓宽了自己思维的空间，打开了研究者的眼界。

十年浩劫之中，人变成了权力意志的工具，变成了残忍的极左政治的筹码。到处都能看到对人的尊严的蔑视和践踏，到处都有人的受难。于是人失掉了自身的价值，失去了掌握自己命运的能力，也失去了对自己作为主体的意识。但噩梦样的往事终于过去了，当极左政治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封建主义的猖狂的复辟结束之后，人们又一次体会到解放的欢乐。通过频仍的持续的灾难，以及对这些灾难的事后的咀嚼和思考，人们更加珍惜自身的尊严和价值了，我把这称为“人的重新发现”。这便是革命人道主义，即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潮流勃兴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心理背景。正因为有这样深刻的历史根据，它才变成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洪流，迅速漫过整个文化思想领域。我把这看作是社会生活领域内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文学创作中对人的命运，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重视、描写和思考，是这种主体意识觉醒的文学表现。一九八四年的创作，继续朝这个方向探索和深化，心理描写更向人的深层情感世界前进，而人的精神活动的内在复杂层面，也越来越受到作家的关注。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而进入文学作品的人，既然是创作过程的描写对象和鉴赏过程的接受对象，就不能不受到文学研究家的重视。一九八四年，刘再复关于人物性格组合的系列论文，就是从一个特定角度对文学创作中人的主体性所做的理论思考。他的这组文章，虽然个别论点尚有不够周延和可以讨论之处，但却摆脱了已往孤立地、静止地、形而上学地研究性格和典型的模式，注重人物性格内在结构的多角度考察，从而把人物性格的研究，推上一个新的阶段。这组文章在创作界和理论批评界引起很大反响，是不难解释的。另外，这一年关于复杂性格的讨论，也都应当看作人们对文学中人的主体性的思考的深化。

对创造主体的研究和重视，是文学的主体意识觉醒的又一个重要方面，这里也包含着文学观念的深刻变化。首先是关于文学是什么，文学的本质特征是什么的一系列思考。把感情确定为文学的根本特征，或把感情视为文学特征的重要构成因素之一，都同一定程度地承认创造主体在创作过程中的表现因素分不开。这就是说，作品不仅仅是再现客观的生活画面，而且还表现主体的自我，还将自我在创作过程中对象化，从而使作品烙上个人情感和性格的深刻印记。本年鉴对有关这方面的探讨和争论，进行了专题介绍。其次，本年关于创作心理的研究也有重要的进展。所谓创作心理，就是研究艺术创作过程中创造主体的各种心理因素、心理结构及其活动规律的。这一研究有助于从创造主体心理活动的角度揭示文学的本质特征。此外，意境问题的研究，风格问题的研究及其在批评实践中的运用，都深浅不同地涉及主体问题，都能看出主体意识在文学中的自觉。

本年，有关接受美学的介绍多起来。接受美学把文学活动分解为两个过程，即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和接受过程，它们互相衔接，又共同组成一个统一的完整过程。在接受过程，即主要是鉴赏过程中，读者，作为接受的主体，被作为文学活动的重要因素来考虑。从本年有关文学鉴赏问题的研究来看，不是因为引进了接受美学，人们才注意了对鉴赏主体的研究，才产生了这方面的兴趣，而是因为对主体的重视，才有接受美学的理论介绍进来，介绍进来之后也才可能产生广泛的影响。

对鉴赏过程的研究，实际上主要是研究读者和作品的关系，并通过作品以及读者阅读作品之后所形成的信息反馈，研究作家与读者的关系。本年，有关鉴赏的心理过程的研究，特别是林兴宅关于艺术魅力的研究，都充分考虑了读者的参与，并且把读者作为鉴赏过程的主体，从动态的审美关系上来确定自己的论点，展开自己的论点。

在文学理论上对主体问题的重视，只不过是对一个一向被人们有意无意忽略了的重要理论侧面的必要补充。它并没有带来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危机，更没有否定反映论的基本立足点，也很难说就是对现实主义的挑战。它只是更强调了认识主体，感受主体，创造主体和鉴赏主体的能动作用，因而把问题看得更辩证些罢了。当然，也毋庸讳言，随着主体意识的自觉和强化，我们的文学观念实际上必然会发生较大幅度的调整。这调整包括：（一）过时的文学观念的扬弃；（二）被实践证明为错误的观念纠正；（三）外来文学观念的移植（包括外国和其它学科）；（四）新的文学观念的创造和补充。这也就是文学观念的更新了。

文艺学方法论的问题，在本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新的研究方法的介绍、学习、讨论，以及在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实践中的试用，开始出现最初的热潮，从而成为这一年文学研究方面的重要的新动向。研究方法问题，与文学观念有密切的联系。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有怎样的文学观念体系，就有怎样的与之相适应的研究方法和批评方法。方法往往是一定的文学观念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文学观念的变化，必然要通过方法的变革表现出来，或以方法的变革为前导。当前，对我国文学界正在展开的方法论的革新潮流，正应作如是观。

文学创作在近些年的长足发展，是文学观念和文艺学方法更新的内动力，而来自自然科学以及新兴的横断学科的冲击波，则是这种更新的外推力。只有从这两个方面加以考察，才能比较确切地说明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方法变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虽然有关文艺学方法论的文章，无论就绝对数量来说，还是就质量来看，都表现出起步阶段的特点，多数只能算是介绍和早期的移植，成熟园练之作，不过是凤毛麟角，但是，这种趋势却展现了广阔发展的可能性，有一股勃勃的生机与活力。

心理学方法，比较文学方法，都说不上是什么新的方法，但由于过去受到长期的压制，所以它们的广泛应用，确也给研究和批评带来不少新意。此外，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方法，发生认识论的方法，结构主义方法，模糊逻辑方法，耗散结构理论，人类学方法，社会学方法等等，都开始出现了移植和应用。其中，应用较多而又较见成效的是系统论方法，如林兴宅关于阿Q性格系统的分析。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则综合了多种新的研究方法，并注意把它们吸收、融化到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为主导的方法论的体系中来。

研究方法问题，因为与文学观念的变革关系密切，所以在文学研究的诸学科都有反映。古典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民间文学，当代文学等领域的研究者中，都开始有人谈论这个问题了。值得注意的是一批年轻的文学评论家，他们知识结构新，对新的方法的吸收和接受快，他们的评论文章确实有新的风貌，独创性很强，虽然也并非没有偏执之处。然而，从他们身上却可以看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事业的明天。

新方法的提倡，会不会导致将自己定于一尊？这种耽心是多余的。因为新方法来自不同学科，各有其不同的适用范围，各有其长处和局限，又不是一种，怎么可能定于一尊？产生这种耽心，是由于人们过去习惯于在“左”倾教条的框子里，按着同一的方式，沿着同一的轨道，重复同一的舆论。所以，这种耽心本身就说明了研究方法更新的必要。

那么，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会不会导致脱离马克思主义？不会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生命力，就是因为它本身不是一个凝固的、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体系。在百余年来的发展中，马克思主义吸收了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成果，不断用全人类的智慧丰富自己，从而始终站在人类智慧的峰颠，永葆青春。过去如此，现在也如此。以方法论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最一般的规律，但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具体学科的具体方法。现在，引入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方法，有些具有哲学意义，如一般系统论，而多数则属于具体方法。我以为，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不妨放出眼光，加以鉴别，用得着的，合理的，先大胆拿来，没有这样的胆识和器度，是孱头，和马克思主义并不沾边。当然，一切新方法的引入和应用，都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不成问题的。有了这个前提，在具体方法的运用上，不妨取一种兼容并蓄的通达态度，让人们去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事实上，无论在文学界，还是哲学界，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有人在探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与自然科学以及横断学科的方法的关系。所以，就大局而言，根本不存在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再说，就我所知，许多力倡新方法的学者，他们都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仅借鉴西方，也借鉴东方。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情况正常得很，大可不必“杞国无事忧天倾”。

总之，一九八四年的文学研究的主流是正常的，建设性的，各个学科都取得了比较重要的进展。民间文学相当重视学科基本理论的建设，神话学以及与此有关的文学发生学的研究，大大地深化了，而藏族长篇史诗《格萨尔传》的研究、搜集和整理更有新的进展与开拓；古代文学除作家作品的研究有所深入外，还注意了宏观流派和诗风的探讨，一些过去研究较少的领域如汉赋、清诗等都有了不少有新见的文章；近代文学研究在过去是文学史的一段空白，属于近几年新建的学科，本年的研究论文虽较前两年少，但对一些重要作家的研究却在深入，资料整理也在扎实地进行；现代文学的研究在探索新的方法和突破，宏观性的考察和思潮流派的研究方面也较文学研究的其它学科有更多的收获；当代文学也比较多地注意到了宏观的研究，批评方法的更新及其实践较为引人注目。大致可以说，当代的文学研究与创作是同步发展的，还不能笼统地说理论批评就一定落后于创作。

文学研究各个领域之所以能取得重要的进展，归根结蒂与党所创造的自由的学术研究环境分不开。环境是外部自由，有了这外部自由的条件，就充分保证了研究者宁静的、自由的心意状态，使他们得以专心致志于科学的攀登和真理的探求而不受干扰。

差不多文学研究的各学科，差不多每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都存在着争论。但争论双方或多方都在平等地发表意见，很少有人为的不正常的政治压力，大家只服从真理，追求真理，这才真正有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劲头。

一九八四年，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是年底召开的第四次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在胡启立同志代表中央致大会的祝辞中，明确地、坚定地提出了创作自由和评论自由的方针。这个方针与我党历来所提倡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它极大地调动了作家、文学研究家和评论家的积极性。只要我们坚持创作自由、评论自由、包括文学研究的学术自由，文学研究的更辉煌的成绩和更大的突破，将是可以预期的。

中国作协创作委员会举行 小说创作座谈会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于4月27日、28日邀集在京部分作家举行小说创作座谈会，就当前小说创作问题，联系1983年获奖的短篇小说进行座谈。

会上，大家畅谈了关于目前创作方面诸问题，如深入生活、文学作品的结构、语言、继承传统与创新以及文学评论等问题。

与会作家一致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文学事业是空前繁荣的，主流是好的，一大批中青年作家充分发挥创作才能，成为创作队伍中活跃的力量。老作家也焕发了青春，活跃了文坛。近年来，长中短篇小说丰收。现实主义传统得到继承，社会主义文学的道路越走越宽。

作家们高兴地看到，1983年度短篇小说创作在思想、艺术上都有新的进展。作家们一致称赞《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那山那人那狗》、《兵车行》等这样的好作品，它们生活底蕴丰厚，语言清新、净美，艺术上比较完整、真切动人，路子很正。草明认为，文学创作搞“突破”不能突破革命现实主义这个“框框”，“创新”要有我们民族自己的创造。如果只是捡起现代派的某些技巧来摹仿，那不是创新，而是拾旧。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还是最好的创作方法。

在谈到文学如何反映生活中，骆宾基说，我们今天的文学，有“广场文学”和“角落文学”的问题。有些很有才华的作者还不善于写出整个时代的风貌。我们需要反映社会各个角落的生活，但不要局限于只写山高地远、深巷小院，只表现身边的花花草草、赏心乐事。应该打开时代的阀门，更深入地把握时代本质，更多地写出反映时代“广场生活”的作品。这是事关整个文学事业倾向性的问题，应引起足够的注意。

在谈到怎样积累、提炼生活时，雷加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作者对劳动人民有深厚的感情，热爱陕北的一草一木，热爱陕北人民淳朴高贵的品质，爱得深沉，写得真切。对

生活真实的描写达到了令人信服的程度，表现出生活中的精微的美，感人至深。它表明了作家和生活的正确关系、作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舒群、遂斐还强调，写小说要讲究结构。要写出撼人心弦的作品，必须要通过精巧的艺术结构，否则就不能达到目的。《那山那人那狗》、《兵车行》在安排线索、处理伏笔、悬念、陡转方面是成功的例子。

舒群、骆宾基还指出，许多好作品的成功之处，还在于能够准确地提炼和运用语言。李纳说，作品的语言应是艺术的语言，要精心提炼。在这方面，一些青年作家注意不够，应该认真地向老作家好好学习。花拳绣腿是容易的，而要达到朴素、准确、简练、传神却很不容易，必须付出很大的努力。

会上，大家还认为，这些获奖作品的出现，评论、编辑等方面的工作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目前评论工作还不能适应文学创作的繁荣局面。姚雪垠说，有些作者写出了好的作品，却感到真有知音。对历史题材作品的评论，也应该认真加强。文学创作需要热情，文学评论也需要热情。

作家们对文艺领导工作也提出了许多恳切的建议。希望作家协会在加强新老作家的联系、发挥老作家“余热”、帮助年轻作家更好地继承革命文学传统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要倡导多谈创作的风气，多召开类似这样的座谈会，不断推进我们的文学创作。

会上老作家们在称赞好作品的同时，对我们文学事业的兴旺发达、后继有人，感到由衷的喜悦。对新人作品中的不足，也恳切、中肯地进行指正。

座谈会由丁玲同志主持。到会的作家有舒群、草明、姚雪垠、骆宾基、雷加、冯牧、葛洛、魏巍、西虹、曾克、李纳、遂斐、林斤澜等。

（原载《文艺报》1984年第6期）

目 录

前 言 何西来 (1)

文学研究工作者笔谈

需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	陈 涌	(3)
文学观念更新的预兆	钱中文	(5)
一个当代文学研究者的感触	朱 塞	(8)
文学研究的时代性漫谈	樊 骏	(10)
问题和设想	王俊年	(13)
古典文学研究的突破与开放性	徐公持	(16)
民间文学研究的光辉前景	刘魁立	(18)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专辑

建国以来美学研究概观	周来祥	(23)
建国以来我国典型理论研究述评	陆学明	(29)
建国以来《文心雕龙》研究概述	李庆甲、汪涌豪	(38)
建国以来先秦诸子散文研究情况综述	江庆柏	(44)
建国以来词学研究述评	施议对	(51)
喜迎文学古籍整理出版的新高潮		
——建国以来文学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程毅中	(65)
建国三十五年来郭沫若研究述评	秦 川	(71)
新中国民间文学事业的发展	刘铁梁、李雅田	(77)
建国三十五年来文艺事业部分发展情况统计		(85)

在沉思中探索

——《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理论一集》导言	许觉民	(86)
历史转折中的文学批评		
——《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理论二集》导言	朱 塞	(94)

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专辑

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祝词	胡启立	(111)
我们的文学应该站在世界的前列		
——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开幕词	巴 金	(114)
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学在阔步前进		
——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张光年	(116)

社会主义文学的黄金时代到了

- 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闭幕词 王蒙 (136)
中国作家协会顾问名单、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会名单 (138)

一九八四年文学研究概况

文艺理论

- 文学理论研究概述 曹有根 (143)
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思想研究 郭斌 (152)
关于文学中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讨论概况 国斌 (158)
关于文学艺术的本质特性的探讨 陈晋 (164)
关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 王淑秧 (172)
关于典型和典型人物性格的研究概况 斯大成 (178)
创作方法问题讨论情况综述 张筱强 (188)
关于文艺创作心理问题的讨论 陈燕谷 (194)
1984——美学研究的新局面 颜模 (198)
文学研究方法论问题一瞥 钱竞 (209)

当代文学

- 当代文学研究概况 蔡毅 (215)
作品争鸣概述 蔡田明 (230)
台湾文学概观 古继堂 (237)

现代文学

- 现代文学研究述评 王保生、孟繁林 (241)
鲁迅研究述评 赵存茂 (253)

近代文学

- 近代文学研究述要 亦箫 (260)

古代文学

- 先秦至隋文学研究综述 李知文 (269)
唐宋文学研究综述 郑永晓 (278)
元明清小说研究述评 崔子恩 (288)
元明清诗文研究概况 尹恭弘 (295)
戏曲研究概述 抒义 (300)
《红楼梦》研究综述 胡小伟 (308)
古代文论研究综述 方土 (314)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研究概述 严昭柱 (331)

少数民族文学

- 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概况 丁守璞、杨恩洪 (337)

民间文学

- 民间文学研究概述 贺学君 (348)
神话研究 贺学君 (357)
传说研究 贺学君 (362)

国外中国文学研究

- 中国新时期文学在苏联 理然 (366)
日本学者对中国近几年部分小说创作的评价 高鹏、井焕 (374)

重要会议及学术活动

- 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联合举行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座谈会 (383)
中国古代小说理论学术讨论会 (385)
列宁文艺思想讨论会 (390)
全国第二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 (392)
全国第二次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 (397)
第二次老舍学术讨论会 (403)
屈原问题学术讨论会 (405)
机智人物故事学术讨论会 (410)
丁玲创作讨论会 (415)
改革题材文学学术讨论会 (417)
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第四届年会 (420)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四届年会 (423)
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 (426)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三届年会 (429)
中国鲁迅研究学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 (431)
吴敬梓学术讨论会 (435)
通俗文学讨论会 (442)
全国第二次近代文学学术讨论会 (448)

新书评介

- 一九八四年文学研究书评文摘 (455)

纪事

- 一九八四年文学纪事 (473)

资料

- 全国性文学评奖获奖作品篇目 (503)
1980—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青年作者优秀论文篇目（文学部分） (503)
首届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获奖篇目 (503)
1979—1983年《红旗》优秀理论文章篇目（文学部分） (503)
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篇目 (504)
1983年《当代》文学奖获奖作品篇目 (505)
1983年《昆仑》优秀作品奖获奖作品篇目 (505)
1983年《诗刊》优秀作品、评论评奖获奖篇目 (506)
1983年《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获奖名单 (506)

首届（1982—1983年）青年文学创作奖获奖篇目	(507)
1983年《儿童文学》优秀作品获奖篇目	(508)
全国性文艺理论和中国文学研究团体简介	(509)
一九八四年全国文学新作篇目辑览	(512)
诗歌集	(512)
散文集	(514)
长篇小说篇目	(516)
中篇小说篇目	(518)
短篇小说集	(530)
报告文学篇目	(532)
话剧剧本篇目	(546)
电影剧本篇目	(548)
电视剧剧本篇目	(550)
地方戏剧本篇目	(551)
儿童文学集	(552)
民间文学集	(553)
一九八四年文学研究新书目录	(555)
一九八四年中国文学研究论文索引（部分）	(569)
本年鉴1981—1984年度编委名单	(452)

文学研究工作者笔谈

需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

陈 涌

文学领域也需要加强基础理论的研究。这是我们的一个薄弱环节。现在大家都承认理论批评赶不上创作的发展，我认为问题主要并不是理论批评文章太少，问题主要是理论还未能很好的回答文艺生活提出的问题，还不很善于对文艺的经验进行理论的总结。

我们的文艺批评就事论事的“手工业”方式，停留在对具体作品的介绍，解释、歌颂的现象还相当普遍，说明了我们这方面的弱点。

理论上准备不足，这是未能克服这个弱点的重要原因。在这方面，如果和哲学界、经济学界比较起来，便会显得更加清楚。

文艺界历史上长期存在着“左”的教条主义的、机械论的观点。现在人们都激烈的反对这类观点，但真正从理论上进行认真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清理，这个工作可以说做得很差。例如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世界观和创作这些问题，过去对它们的处理的确存在着可以说是严重的“左”的片面性，但这是一些关系重大的基础理论问题，本身有它们的复杂性。只有对这些问题在理论上有完整的理解，才能正确地批判“左”的片面性。

过去把政治和艺术完全对立起来，把政治标准绝对化，对文艺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和地位机械地理解，很不利于文艺的正常的发展。不可否认，几年来文艺创作的繁荣、发展，从根本上说，是纠正了过去在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左”的思想，在比较合理地解决文艺、生活、政治的关系的条件下取得的。但许多优秀作家的创作实践方面的好经验还

需要正确地加以总结。不可否认，对这个问题，我们还有着认识上的分歧，还需要继续认真探讨。例如：在阶级社会里，或在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消失的社会主义社会里能否把政治标准从文艺批评的标准中完全排除出去？能否从根本上否认“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个原理？这都是令人注目，不但关系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也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需要认真地实事求是地从理论上，从总结过去和现在的经验基础上加以澄清的问题。

只有从理论上解决，才能说是真正彻底的解决。如果在理论上含糊不清，心中无数，在反倾向的时候也就很可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不可否认，近几年，在克服“左”的思想的时候，有一些人对文艺的思想政治要求减弱了，另一方面也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有了某种程度的抬头，或在复苏。这里的原因不只一端，但在对待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没有全面地总结历史经验，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的偏离，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要反“左”。“左”的思想的确是影响深远的。但反“左”应该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应该完整地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来进行，不能因为应付临时需要，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原理，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这种实用主义态度最有害不过，它给我们带来思想混乱。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在现在不时可以发现。

基础理论有一部分研究文艺的社会本质，这主要是和世界观历史观相联系的，属